

# 1932 年的石碑山

—— 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

[英] 毕可思

前人足迹有时很难追查，有关下面将要讲述的一些事情——它们耗费当地和国际上许多行为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以及至少两个人的生命——的记录仅仅简单地提到，1932 年 2 月 28 日红军士兵占领了汕头附近的石碑山灯塔（Breaker Point lighthouse），撤退时，他们“带走了”一个灯塔管理员（俄国人）和一个仆人，留下了一封写给英帝国主义和香港总督的信。故事由此就产生了。乍看之下这只是一个不会产生确定后果和没有什么力量的政治姿态。<sup>1</sup>“英帝国主义者”对潮普惠苏维埃政权——其主席在信上留有签字——的宣言或者其暂时占领一个中国灯塔行为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灯塔距离英帝国最近的正式前哨香港 100 多英里，而中国海关——其海务处（Marine Department）管理着中国航标灯系统——属于中国国家的一个代理机构，它向民国政府财政部报告了此事。没有人去关心一个俄国人。1999 年编纂的《惠来县志》谈论了一些灯塔情况——直到 2002 年该灯塔仍是亚洲最高的灯塔之一——，但没有提及这个事件，尽管它钜细靡遗记录了同年被“保安”队（Pacification forces）杀死的革命烈士的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sup>2</sup>他们中的一些是在搜寻俘虏过程中被杀的。《汕头海关志》附加地提到有一个英国人也被带走了；此人的确是个英国人，尽管他的英国人身份很勉强。<sup>3</sup>他的名字叫奕伟士（Charles Hugh Edwards），是一个条约口岸欧亚混血者，他的混血儿身份道尽这件被遗忘的事件中官方诡异的处理方式。它发生在远离条约口岸中心的地方，此事件的主角的血统和职业使他远离英国或国际性的中国人世界。然而，透视奕伟士和逐侠诺（Alexander Nickolaevitch Andreyanov）的悄然死亡可以提供一个说明 1932 年 2 月 28 日把他们安排到石碑山灯塔的体制和社会的机会。

就 1932 年的标准来看，灯塔管理员被抓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会引起多大注意的绑架事件，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揭示发生在灯塔内部及其周围的种族、阶级和民族冲突的机会；这些灯塔是中国海关在 1870—1940 年代建立的，它们遍布从广西到辽宁的沿海地区。技术的现代性与灯塔职员及他们的邻居在灯塔阴影里进行的人类卑劣勾当形成了鲜明对照。理解这个世界也许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在中国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殖民主义世界的影响和特征，以及由它们所造成的难题。在对实际存在过的殖民主义有长达数十年的忽视（在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是支持者的描述还是反对者的描述，帝国主义都受到了偏袒，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研究这个主题，对外国强权的问题和进程——它的

---

<sup>1</sup> 《中国近代海关大事记》，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年，第 290 页。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Breaker Point 的中国名称被写作石碑山灯塔，亦称赤澳灯塔。

<sup>2</sup> 《惠来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283、797—806 页。

<sup>3</sup> 《汕头海关志》，汕头：汕头海关编志办公室，1988 年，第 27 页。

实践、文化输入、占有、适应—进行“精确的”（就像柯文在 1984 年对学术界的嘱咐）探究。<sup>4</sup>在完全中国中心的年代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断了与那些论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文献的联系，而这些文献或许能为理解中国近代经历的特殊方面提供更扎实的基础。他们也开始讲不同的语言（在此，人们立即就会想起“非正式的帝国” [informal empire] 和“半殖民主义” [semi-colonialism] 等概念），尽管也努力消除愈益增大的缝隙。<sup>5</sup>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我们对中国条约口岸中外相互作用的这项传统学术研究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对殖民地、租借地、特许权、新拓居地（settlements）、自愿开放的市场等有了日益深入的认识，它们都是中国国家为控制外来国家或外来民族而设立或放弃的，尽管我们事实上仍对它们当中的许多东西缺乏适当的研究。<sup>6</sup>例如仍然没有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条约口岸的报纸、在法国的法帝国分区（French empire in China）等进行过研究，但新工作毕竟还是做了一些，比如对海关、美国的对华法庭（US Court for China）、满洲国、日本的领事体系等的研究，它们正在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我们同样得到了新的、专门探讨传教士的遭遇和相互作用的学术著作。<sup>7</sup>

---

<sup>4</sup>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编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 年（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第 147 页。

<sup>5</sup> 贺远刚：《20 世纪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和非正式帝国：一个分析框架》，载沃尔夫冈·莫姆森和贺远刚主编：《帝国主义及其以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伦敦：艾伦和盎文，1986 年（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Mommsen &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第 290—314 页。

<sup>6</sup> 在此，法国的广州湾租借地领域映入了我们的脑海。为了什么？那儿发生了什么？

<sup>7</sup> 择其要者：关于海关问题请参见我本人新近的著作；文章被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编辑到《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40: 3（2006），第 545—736 页，和他正在编辑的把海关视作中国的一个全球化机构的论文集；毕可思和安克强主编《新边疆：在东亚的帝国主义新共同体，1842—1953 年》，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0 年（Robert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 (eds), *New Frontiers: 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 - 195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芭芭拉·布鲁克斯：《日本的帝国外交：领事、条约口岸和 1895—1938 年的中国战争》，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 年（Barbara J. Brooks. *Japan’s Imperial Diplomacy: Consuls, Treaty Ports, and War in China 1895 - 193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伊莱恩·斯库丽：《与遥远国家的交涉：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美国公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 年（Elaine Scully, *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杜赞奇：《主权国家和真实性：满洲国和近现代的东亚》，兰哈姆：罗曼和里特费尔德，2003 年（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罗芙芸：《卫生学的现代性——卫生和疾病在中国条约口岸的含义》，伯克利：加尼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 年（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关于传教士和基督徒参见亨利埃塔·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正在进行的工作。好的研究包括唐日安：《福州的新教徒和 1857—1927 年近代中国的形成》，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 年（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 - 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李榭熙：《圣经和枪：华南的基督教，1860—1900 年》，纽约和伦敦：罗特莱哲，2003（Joseph Tse-Hei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较早

但是对这个相互联结的世界的基础结构我们仍然没有太多了解，如同我们经常迈行的学术研究，聚焦于特别的场所和城市。<sup>8</sup>航标灯是海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活动（这些活动部分地属于国家性质，比如安排人到商品和人进出中国的固定地点）的一部分，有些基础设施建于中国沿海及其主要河流上，并与全球国际中首先倡议的项目联接起来（例如水文工作），但是这些项目被设置在外围社区旁，或是邻近这些外围社区，而其职员都非常特异或是由这些职员的家人——更加特异——所充任。在《帝国塑造了我》一书中，我探讨了上海中下层英国人的招摇撞骗行为。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同类复杂面目的另一面则可以在航标灯和 1932 年的石碑山灯塔中发现。本文首先要概述一下航标灯服务的发展情况，然后再讨论一下由灯塔人员配置问题所引起的一些争议，最后则通过 1932 年事件进一步说明这些争议。石碑山不是一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象征性标志姿态的场所，但却是一幕位于更为复杂的、并且可能是相当肮脏的秘密戏剧之中的公共场景。而且，它与支撑和规定条约口岸世界的结构和进程有着精确的联系。

## 灯塔体系

由海关发展的灯塔系统就足以写一份报告。<sup>9</sup>要谨记的背景重点是，从 1860 年代起出现了一股科技动力打开了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航路。制灯工艺的技术进步（菲涅尔透镜）、蒸汽船的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电报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的扩张和影响，在 1860 年以后的 50 年里扩展了航标灯服务系统。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海岸、东南亚、日本和中国沿海地区，制定了海岸航标灯方案。<sup>10</sup>1842

---

的有简·亨特：《绅士们的福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中国的美国妇女传教士》，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 年（Jane Hunter's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8</sup>罗安妮：《在中国的航运帝国主义：汽船、半殖民地和民族，1860—1937 年》，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耶鲁大学，2002 年（Annie Reinhardt's 'Navigating Imperialism in China: Steamship, Semi-colony, and Nation, 1860-1937'.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2），是一个很好的矫正。

<sup>9</sup>我实际上有一份草稿，临时命名为《照亮中国沿海》，它比较深入且从比较的角度揭示了内容广泛的航标灯规划及其运作情况。主要的出版资料来源是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关于中国海关航标灯服务的图解》，上海：稽查总局统计处，1932 年（T. Roger Banister, *The Coastwise Lights of Chin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Lights Servic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932）。

<sup>10</sup>艾里克·塔格里亚科佐：《明亮的群岛：沿海照明和东南亚岛屿上的帝国眼睛，1860—1910 年》，载《科技与文化》46：2（2005）（Eric Tagliacozzo, *The Lit Archipelago: Coast Lighting and the Imperial Optic in Insular Southeast Asia, 1860-1910*, i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6:2 (2005)），第 306—328 页；奥利弗·柴科兰德：《理查德·亨利·布鲁特恩与日本的航标灯，1868—1876 年，一个出类拔萃的工程师》，载《纽可门学报》63（1992），第 217—228 页（Olive Checkland, 'Richard Henry Brunton and the Japan lights, 1868-1876, a brilliant and abrasive engineer'. *Transactions of the Newcomen Society*, 63 (1992)）；《建设日本，1868—1876 年》，理查德·亨利·布鲁特恩著，休·科塔兹引介，福克斯顿：日本图书馆，1995 年（*Building Japan 1868-1876* by Richard Henry Brunt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ugh Cortazzi. Folkestone: Japan Library, 1995）；Jacques Thobie, *L'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 des Phares de l'empire Ottoman et la Société Collas et Michel 1860-1960* (Paris: L' Harmattan, 2004). Thobie's *Phares Ottomans et Emprunts Turcs, 1904-1961: Un type de reglement financier international dans le cadre des traites* (Paris: Editions Richelieu, 1972) 主要侧重于租界后期的财政史。

年以后，航行至中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放，中国条约口岸及其附属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正在进行。外国商人和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和“中国”）需要什么——外滩、街道、仓库、制度、专业知识、信息和法律等。<sup>11</sup>海关则为评估税收收入提供了他们熟悉的和有效的制度（诸条约强迫一种他们了解的政权和低关税）。在中国确定了通道和桥头堡后，海关的任务就朝向安全通航的方向努力了，这也是赫德（Robert Hart）制定的“便利中国沿岸通航”的计划。<sup>12</sup>

海关的灯塔建设曾出现过三次高峰期：1870年代早期，1880年代早期和在戴理尔（W. F. Tyler）被任命为海务巡工司（Coast Inspector）后之1901年。戴理尔制定了一项全新的现代化和建设项目。到1904年，戴理尔和他的总工程师（Engineer-in-chief）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建造一座第一线灯塔（就是沿岸灯塔）。虽然这个位于遮浪角（Chilang，在香港与汕头之间）的灯塔直到1911年还未建成，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建设工程和现代化项目已经付诸实施；大约到1910年，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灯塔链”。<sup>13</sup>海关海务处设在上海，从这个总部算起，到1940年共建立了4个灯塔区，琼州（Kiungchow或Hoihow）、厦门（Amoy）、上海、芝罘（Chefoo）。海务巡工司负责全部管理事务，包括上海灯塔区。厦门和芝罘各有一位沿海官员负责，琼州则受琼州港督（Harbour Master）管辖。海关灯塔运输船（Customs Lights ships）负责检查设施、供应货物、配置员工和调动其家属，他们也为各个灯塔提供补给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赫德的目标已经实现。“沿中国海岸的航行”现在已经便利多了，而且船只可以明确地沿着海上航道和河流航线航行。虽然船舶仍会受损，但中国沿海商船先前经常会遇到的航路风险大大减少了。海关对这一工作沾沾自喜，在其出版物中，也在187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的国际展览会（直到1905年都由海关组织筹措）中，极力宣扬它对“人类”的服务和对中国的贡献。这儿有一个关于成就的故事，该故事在讲英语区（Anglophone culture）的居民中早已耳熟能详了；他们已经多次庆祝过灯塔和灯塔工程师的独特业绩。<sup>14</sup>在这个倡议下，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海关将中国纳入了专业的“帝国职涯”（imperial careering）的广阔世界，用戴维·兰伯特（David Lambert）和艾伦·莱斯特（Alan Lester）的

---

<sup>11</sup> 有两部著作分别论述了巩固和发展进程的不同方面：凯里·L. 麦克菲森：《一片沼泽：上海公共健康的起源，1843—18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毕可思：《管理上海维持通商口岸的治安》Changlin Ma (chief ed.), 《租界里的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71—292页。

<sup>12</sup> 总税务司通令，10号，1868年4月25日，载《总税务司通令》，第1系列，1861—1875年，上海：稽查总局统计处，1879年（I.G. Circular No.10, 25 April 1868, in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First Series: 1861-187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879），第138页。

<sup>13</sup> 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15页。

<sup>14</sup> 主要出版物有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尽管大体说来，很少有学术著作论述灯塔，就是在技术史文献中也不多见，人们仍可以参见上面引用过的作品以及 Vincent Guigueno's 'Des phares-étoiles aux feux-éclairs: les paradigmes de la signalisation maritime française au XIX<sup>e</sup> siècle', *Réseaux* 19 (No.109) (2001), pp. 95-112. 贝拉·巴斯特：《史蒂文森灯塔站》，伦敦：哈珀考林，1999年（Bella Bathurst, *The Lighthouse Stevenson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9）是一部比较好的通俗读物。大多数作品既是备忘录又画册——灯塔是风格固定且适宜语拍照的。很多以前的人工站点现在都成为了遗迹，这就导致了更多相关出版物。

话说，就是它招揽了一些技术熟练的专业人才进入服务部门。对于所有这些在中国沿海举办的外国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让它自己被世人听过并且能够吸引医生、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才来；它们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非常有利于计划的实施。当专业人才在英帝国和讲英语区以及其他的机会中载浮载沉时，中国就成为了部分甚或全部职业工作者的一个常规的、正式的目的地了。<sup>15</sup>

对过往船只来说，这些是夜晚的航标灯（每一个都有一种可识别的标志<sup>16</sup>），我们应该想到它们也是新声音的发出地（包括，在不同行程中、雾炮和气压雾笛（compressed air sirens）；对于白日的航行来说，它们是各个被固定的点。它们还是一些场所，而且通常都有邻居。灯塔站显然是一个有外国人的地方。大多数海关建筑实际上都与坐落于河岸码头边或条约口岸海港边的中国沿海本地建筑混合在一起。<sup>17</sup>灯塔矗立在农村海岸边。建造这样一个灯塔一般需要重新划定一个地方来适应灯塔及其附属建筑和员工食宿问题，而且能看到外国人、来自外地的中国人进入了这些孤零零的沿海区域，还有外国商品和新的工作机会。灯塔经常发展当地的功能。它们是中国人国家的前哨；危机时刻经常被当地共同体用作安全港，但我不得不说，总体上用处不大。灯塔系统是这样一种设计，它蓄意地扰乱中国人的沿海地区以便为有序的、可预报的、安全的通行提供保障，在最大的限度下开发中国沿岸。但是灯塔本身，以及维护它们的员工扰乱了当地社区，并且是赫德在 1868 年的计划或海务巡工司（first Marine Commissioner）在 1870 年的计划中所未曾预见的。<sup>18</sup>它们是自成一体的共同体，

---

<sup>15</sup> 最显著的海关例子就是帕特里克·曼森先生（Sir Patrick Manson）了，他开创了热带医学学科并以一位海关外科医生身份为之效力。道格拉斯·M·米海因斯：《帝国医学：帕特里克·曼森与对热带疾病的征服，1844—1923 年》，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 年（Douglas M. Haynes, *Imperial Medicine: Patrick Manson and the Conquest of Tropical Disease, 1844–192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关于专业人员的循环问题参见戴维·兰伯特和艾伦·莱斯特主编《超越英帝国的殖民生活：漫长 19 世纪的帝国职业生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年（David Lambert and Alan Lester (eds), *Colonial Lives Across the British Empire: Imperial Care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16</sup> 在 1948 年：临高（Lamko）每 20 秒闪一次白光；南角（Cape Cami）每 20 秒闪两次白光；遮浪角三次白光；石碑山闪一次白光后再跟两次。《1948 年中国沿海和河流上的灯塔名称、光船、浮标、灯塔等》，上海：海关稽查总局统计处，1948 年。

<sup>17</sup> 关于条约口岸的建筑参见：陈余（音）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城市化转型：1903—1937 年鼓浪屿的国际拓居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2006 年（Chen Yu,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Semi-colonial China: Gulangyu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03–1937*. Unpublished PhD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乔纳森·法利斯：《住在帝国边缘：中国广州的外国人和建筑》，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康乃尔大学，2004 年（Johnathan Farris, *Dwelling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oreigners and Architecture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2004）；琼·W. 休伯纳：《上海外滩的建筑》，载《远东历史文献》39（1989），第 127—165 页（Jon W. Huebner, *Architecture on the Shanghai Bund*,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39 (1989)）；杰弗里·W. 科迪：《中国的建筑：亨利·K. 穆菲的“适应性建筑”，1914—1935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18</sup> 《水手通知 A, 63 号, 1870 年 8 月 1 日》，载《水手通知》，第 1 期, 1862—1882 年, 上海：稽查总局统计处, 1883 年。（Notice to Mariners A, No. 63, 1 August 1870, in *Notices to Mariners. First Issue 1862–1882*.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3）。

是处在激烈氛围中的一些微观场所；在这里，帝国的张力得到展现，受到争论，遭到打击。

## 灯塔的人员配置

这些沿海灯塔是国家计划中的一些被连接到国际网络上的点（nodes），它们同时又是中外交汇之地，其情形非常复杂。<sup>19</sup>对于这一工程来说，合格的工程师是十分重要的，灯塔管理员也是如此，因此，海关招募了一些欧洲人来操作、管理机器设备。赫德认为中国职员仅在“其他方面称职”，中国职员不能被信任，无法被监督，晚上都不关灯。一种种族等级制遂被设计出来，并被落实到每一座灯塔：一位欧洲人，一位“马尼拉人”（Manilaman）或菲律宾人和六位中国人。<sup>20</sup>这种按照种族招募工作人员的方式在条约口岸世界的海关及商业、行政和其他机构中都得到了效仿。但是天资聪明的人不会选择灯塔职业，灯塔所招募来的员工多是中国国家中素质低下的外国人，这些人为海关带来了问题。赖嘉玲（Catherine Ladds）新近已经阐明了外国人在海关中就业的广阔背景，看到了海关为外国男人提供的工作机会以及这些机会对他们在华生活和工作（作为内班工作人员并在较低层次上作为外班员工；他们到处都构成外籍海关职员的90%）的影响。她的论文突显了外籍总税务司署的平庸，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开放给英国人，尤其是当世界各阶级都被英国帝国打开了，同时也把其平庸的限制给打开了。<sup>21</sup>

采取了一种特定方式来从事（和迈入）灯塔站工作。斯立（T. Clark）是一位超等一级灯塔管理员（Chief Lightkeeper A），他在1934年6月写到，“不是所有的事情听起来都十分美好”。他在工作了25年后，请求允许退休，“如果可能的话就退休”（他把pension写成了Penchion）。<sup>22</sup>他那毫无文采的笔记谈到了大量被实际配置到灯塔站的男人的情况。赫德最初并不确信他能够招募到充足的、具有奉献精神的欧洲人充当灯塔管理员（“性情温和并且能够忍受孤独”），取而代之，他建议编制花名册，让登船检查的海关稽查员（tidewaiters）每人每两年到一个灯塔待4个月。<sup>23</sup>到1875年，形势受到了重新考虑，一种等级体系（a system of ranks）被设计出来，现有的雇员都被列入新级别中去。<sup>24</sup>1874年，赫德指示金登干（J. D. Campbell）从欧洲招募有经验

---

<sup>19</sup> 恰如海洋交通和水文知识网络，它们也被连接到气象网络上，赫德还想利用它们进行更广泛的科学研究工作：比科尔斯：《照亮中国沿海》。

<sup>20</sup> 总税务司通令，20号，1868年6月22日，载《总税务司通令》，第1系列。（I.G. Circular No. 20, 22 June 1868, in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First Series）。

<sup>21</sup> 赖嘉玲：《帝国就业者：中国海关服务处的外籍员工，1854—1949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布里斯托尔大学，2007年（Catherine Ladds, *Empire Careers: The Foreign Staff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4-1949*.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stol, 2007）。

<sup>22</sup> 斯立（Clark）致海岸巡稽卡乃尔上尉（Captain Carrell），未注明日期，大约在193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SHAC），679（1）3981，《职员：航标灯，1932—1937年》。申请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938年4月，即在工作了30年后，才被允许退休。

<sup>23</sup> 总税务司通令，20号，1868年6月22日，载《总税务司通令》，第1系列（I.G. Circular No. 20, 22 June 1868, in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First Series）。

<sup>24</sup> 总税务司通令，11号，1875年8月1日，载《总税务司通令》，第1系列（I.G. Circular No. 11, 1 August 1875, in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First Series），第615页。

的灯塔管理干部，他可以指导从中国合适地方招募的员工。<sup>25</sup>1877年，他要求从伦敦来12位这样的人。<sup>26</sup>现在，人们可以从试用灯塔管理员开始工作并留在灯塔度过全部海关职业生涯了。这些职员大多数属于临时性的，始终是外班员工，但也有的人固定在那里了。<sup>27</sup>英国人D. F. 波特尔豪 (D. F. Botelho) 在1871年成为副灯塔管理员，1911年10月死在任内，此时他已晋升到超等一级灯塔管理员。大多数长期服务者后来转移到了岸上，改作能够接触较多人的外班员工；在那里，或许事情是“十分美好的”。

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招募来的人员大多是先前的海员。在1949年之前的80年间，至少600人供职于灯塔。10人中有4人(250人)是英国人，而德国籍员工共有80人。<sup>28</sup>海关得到了它应当得到的东西，虽然从未招募不足，而且欣然地不再雇用不适合的人——几乎四分之一的英国人被解雇或者被开除(前者演化成后者)。所有海关工作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受到定期的工作评议。清醒和气质 (Sobriety and Temperament) 一对中国员工的显著态度——是经常出现的问题。从1908年厦门的半年报告中，人们可以得知史礼范 (R. Stephan) 对中国员工“非常粗暴”，而在香港出生的安东尼奥·玛丽亚·多斯·桑托斯 (Antonio Maria dos Santos) 是“一个头脑清醒并且可靠的灯塔管理员，但他不知道如何与本土员工打交道”。1916年12月关于德国人德礼逊 (J. A. Tellesen) 的报告也指出他“明显地缺乏与其员工和睦相处的机智”，而韩孟得 (W. Hammond) “过去爱酒如命的嗜好似乎消失了”。<sup>29</sup>抱怨都缺乏“官方的礼貌”，在这些与海关纪律严格的日常生活没有紧密联系的男人当中，不服从的品行大概是不会想不到的。1942年，荷兰人邬特 (Marinus van' t Wout) 发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坦率声明：“如果我要打一个上海的灯塔管理员，我必须有很好的理由来这样做，或者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他继续说，“我不是习惯于把手臂勒住当地职员的脖子逼迫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sup>30</sup>只要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站点秩序，令人放心地做他们的正常工作，“粗暴”、“爱争吵”和“不识字”都是可以容忍的。事实上，1917年全部解雇奥地利和德国海关职员一事令人沮丧地回忆起他们某些方面的优点。毕竟德国人十分勤劳，乐意花

---

<sup>25</sup> 金登干致赫德，101号，1874年10月9日，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中华书局，1995年。

<sup>26</sup>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0年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Published for The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1950)，第300页；赫德致金登干，163号，1877年1月3日，北京总税务司署 (Hart to Campbell, No. 163, 3 January 1877, The IG in Peking)。

<sup>27</sup> 赖嘉玲：《帝国就业者》。

<sup>28</sup> 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团体，48个美国人，40个挪威人，32个瑞典人。

<sup>29</sup> 琼州，1908年6月30日；厦门，半年报告，31/12/08，SHAC 679(9)，1743，《1908—1910年的灯塔员工》；《上海海关灯塔员工的秘密报告》，1915年12月31日；《上海灯塔员工》，1916年12月31日，679(9)，1744：《外班员工，1909—1911年》(Kiungchow, 30 June 1908; Amoy, Half-yearly reports, 31/12/08, SHAC 679(9), 1743, 'Lights staff 1908-1910; Shanghai Customs Lights staff confidential reports, 31 December 1915, Shanghai Lights staff, 31 December 1916, 679(9), 1744, 'Outdoor Staff, 1909-1911')。

<sup>30</sup> 声明，3号，邬特，一级灯塔管理员，1942年2月27日，载《海关税务司》，7232号，1942年3月17日，现存于SHAC 679(1)，12524，《邬特先生的职业，1929—1949》(Statement No. 3, M. F. Van' t Wout, 1<sup>st</sup> Lightkeeper A, 27 February 1942, in CI No. 7232, 17 March 1942, in SHAC 679(1), 12524, 'Mr. M. F. Van' t Wout's Career', 1929-1949)。

力气护理他们的灯塔花园，使其站点质朴美观。相比之下，英国籍员工整体而言是懒惰的。<sup>31</sup>

尽管有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尽其所能的监控，但在灯塔站里似乎仍存在着阴郁的暴力文化，尽管有阻碍其蔓延的因素，酗酒和无节制仍十分猖獗。灯塔酝酿着低水平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由于对员工重复和不断的要求，也就是一夜又一夜的例行公事，而更加恶化。（更糟糕的是，在 19 世纪，航标灯使用的燃料是植物油，它在燃烧后总会在灯芯上留下了厚厚的渣子，需要不断地清理以便保持灯具的清洁和明亮，灯塔管理员因此获得了“灯芯子”的绰号）。白天要擦洗、清洁和维修被风和水损坏的设施。但欧洲员工手头上仍然有时间：他们的中国下属会在他们最高权威下承担全天的苦差事。就象他们在正式的帝国中所作的那样，低级阶层的欧洲人在条约口岸基本上发挥着监督功能。尽管他们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没有他们也不行。所有的社会事业性质的结构，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都是为了方便这一点而设计的。如果它们的员工照章办事，这些结构就会象计划的那样运行，但是监督中时常伴随着一拳或一脚。

德国人撤走后，人员构成中最大的变化是俄国人来了，他们后来成为了主宰（1939 年达到受雇人数的 10 / 27）。这些人很少有别的就业选择。1927 年的一则报告指出，在海关拟招募的俄国人中，有“法官、罗马法教授、骑兵军官、步兵军官、杂役和木匠”。除杂役外，他们都不像是适合灯塔工作的。<sup>32</sup>如果说在海关中英德的关系经常是友好的，就象实际上在全部条约口岸共同体中的情形那样，那么英国人与白俄罗斯人的关系就是差的。白俄罗斯人由于没有国家和贫穷备受外国人的歧视，俄国男子在岸上经常会遭到其他外国人的虐待和毒打。<sup>33</sup>但是一旦教授和法官都牙一咬眼一闭，其余的俄国人肯定会成为忠诚的灯塔管理员。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与他们航标灯相依为命。逐侠诺就是这样一个人。关于他，文件所显示出的信息极少。他于 1898 年 10 月 14 日出生在托木斯克 (Tomsk)，原先曾是一名军官。他的唯一一位知名的亲属，他的一个姐姐，已经移居罗马尼亚 (Romania) 了。5 年半前，逐侠诺进入了海关，直接成为了三等二级灯塔管理员 (Third Lightkeeper, B)，他没有结婚，但他的“管家” (housekeeper) 与他同住在石碑山灯塔站。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关于她的国籍有多种说法，比如日本、中国等等，这种不精确性产生于海关对记录其情况一事缺乏兴趣。<sup>34</sup>

<sup>31</sup> 在 2000 年第一次访问时，我在档案馆里发现了这一文献，但我丢失了参考证明。

<sup>32</sup> 海岸巡稽奚理满致海关总税务司，3910 号，1927 年 7 月 21 日，现存于 SHAC, 679 (19), 15947, 《工程师和中国灯塔看守员培训学校》(Coast Inspector, H.E. Hillman, to I.G., No. 3910, 21 July 1927, SHAC, 679(19), 15947, ‘Training School for Engineer and Chinese Lightkeepers’ )。

<sup>33</sup> 毕可思：《帝国塑造了我：一个英国人漂泊在上海》，伦敦：艾伦·莱恩，2003 年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 Allen Lane, 2003)，第 184 页。关于俄国人可更多地参见马西娅·雷恩德斯·里斯泰诺：《作为最后去处的口岸：上海外国人散居共同体》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Marcia Reynanders Ristaino, *Port of Last Resort: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34</sup> “根据官方记录，我们知道逐侠诺先生是没有结婚的，虽然有一个自称为他妻子的人到本局就是否能够得到抚恤金一事进行过试探性咨询。她被认定为一个非正式配偶。”海岸巡稽指许礼雅，S/O，汕头，1933 年 7 月 27 日，现存于 SHAC, 679 (1), 3659, 《石碑山灯塔绑架事

在最好的时候也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一些要求调动或允许辞职并伴有哀怨的信函抵达了厦门、芝罘和上海——有一个人写道：“我感到太寂寞了”——而管理部门的人员配置决定已经注意到工作对其雇员的影响：“将他安排到灯塔站是不明智的，部分是因为他的健康，而且也因为如此的孤独会使他患上抑郁症”；“很显然，在各灯塔站长期的孤独生活已经严重影响他的性格、健康和能力。”<sup>35</sup>而且如果在某个站点的工作人员之间出现敌对关系，局势就会变得更坏了。指控和反指控充满了文件（并且经常通过同一补给船寄出）。一个俄罗斯看守者向他的中国下属借钱，拼命喝酒，而且在站内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了 50 枪。他的副手大喊救命，“这个人在清醒时也不象正常人，如果喝醉酒——这是经常的一就更可怕了。”这个俄罗斯人遂被解雇了。<sup>36</sup>1922 年 12 月，负责乌丘屿（Ockseu）灯塔的管理员打死了他的助手和这个男人的女管家，他本人也随后自杀了。<sup>37</sup>灯塔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这些男人通常是结了婚的，或者有实无名，他们的家属同他们一起住在站里，或者在当地或其他地方置办了住所。闲散的欧洲员工在性生活中找到了娱乐和慰藉。在我们所掌握的唯一一本外籍灯塔雇员回忆录中暗示了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有些甚至是非常俗艳的。<sup>38</sup>许多男人娶了日本或中国籍女人为妻，或与之有长期伙伴关系。这是条约口岸中低级阶层外国人生活的一个共同特点：在精英人物的涉外公司中，种族和种族主义者的婚姻禁忌受到严格遵守，但在被低级阶层的男人当中毫无约束力。<sup>39</sup>事实上，他们只有很小的选择余地。中国沿海社区以男性为主的男女比例十分不平均，而且直到白俄罗斯人到来之前，未婚的欧洲妇女的数量很少。那些适婚者通常找到一个比外班海关职员社会境况好得多的伴侣，根本不会去接触灯塔管理员。但这项服务更适合于已婚的男人。人们希望已婚的雇员是安分的男人。虽然孤独是一个问题，但大多数站点容纳了家庭，许多

---

件》，1932—1935 年（Coast Inspector to H.D. Hilliard, S/O, Swatow, 27th July 1933,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sup>35</sup> 鄂特在厦门快信中的信函 7681, 1929 年 5 月 14 日, 现存于 SHAC, 679 (1), 12524, 《M. F. 乌特先生的职业, 1929—1949》（Letter from M. F. Van’t Wout in Amoy Despatch 7681, 14 May 1929, in SHAC 679 (1) 12524, ‘Mr. M. F. Van’t Wout’s Career’, 1929-1949）；海岸巡稽对厦门快信的批复 9201, 1936 年 2 月 26 日, 现存于 SHAC 679 (1), 3981, 《员工：灯塔, 1932—1937 年》（CI comments on Amoy despatch 9201, dated 26 February 1936, SHAC 679 (1), 3981, ‘Staff: Lights, 1932-1937’）；海岸巡稽, 6550 号, 1938 年 2 月 24 日, 现存于 SHAC 679 (1) 10724, 《T. Clark 先生的职业, 1929—1938》（Coast Inspector No. 6550, 24 February 1938, SHAC 679 (1) 10724, ‘Mr. T. Clark’s Career, 1929-1938’）。

<sup>36</sup> 海岸巡稽致总税务司, 5345 号, 1934 年 8 月 1 日, 和附件, 现存于 SHAC 679 (1), 3981, 《员工：灯塔》（C.I. to I.G., No. 5,345, 1 August 1934, and enclosures, in SHAC 679(1), 3981, ‘Staff: Lights’）。

<sup>37</sup> 班尼斯特：《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标灯》，第 104 页。

<sup>38</sup> Ed 古尔德：《哲学家灯塔站——比尔·斯科特的冒险》，萨尼奇藤：汉考克出版社，1976 年（Ed Gould, *The Lighthouse Philosopher: The Adventures of Bill Scott*. Saanichton: Hancock House, 1976），第 82—83 页。W. A. 斯科特在 1924—1943 年间担任海关灯塔技师。

<sup>39</sup> 毕可思：《在华的英国：社团、文化和殖民主义，1900—40 年》，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 年（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第 95—104 页。更广泛的探讨可见安·劳拉·斯特勒：《性关系与帝国权力：种族和殖民地统治中的亲密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员工不能提供什么东西，但他们的家属可与之生活在一起。至少有两起住在站点上的妻子自杀事件是出了名的。<sup>40</sup>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是重大的事。一些孩子被送到上海汉壁礼西童公学（Thomas Hanbury School）上学，这个学校是为向欧亚混血儿童提供教育建立的，而且在其他情况下，妻子就住在上海或厦门。<sup>41</sup>斯柯达（W. A. Scott）的妻子在佘山（Shaweishan）灯塔站住了一段时间，但在离开上海后，社会生活证明是非常有限的。1936年，她和3个孩子迁居到这对夫妇在北戴河购买的一栋房子里，并把它搞得像一个度假宾馆。<sup>42</sup>虽然站点方便的家庭生活解决了一些潜在的问题，但它创造了或者加剧了另一些问题。文件中包含有许多描写在微小的站点共同体温室氛围中可能在夫妻（和他们的仆人）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的文献。海务巡工司不仅要管理航标灯结构系统，而且还要关心该系统的员工，他们家内痛苦和紊乱。

很显然，灯塔对它们身处其中的当地居民共同体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虽然一些地方位置相当偏远，必须乘船才能抵达，但是灯塔站都有人值守，而且外国籍海关雇员也来到了这些沿海地区。灯塔还为当地男人（如作供货者、擦灯人、仆人等）和女人（如作仆人等）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在北渔山柯生利和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到1941年已经受雇40年了，他们保障了货物供应，也“让村民不致骚扰灯塔管理员和财物”<sup>43</sup>。站点提供诱人的各种各样储藏物，而员工的财产也很容易变成引人犯罪的动机。奕伟士的妻子在被绑架后要求赔偿的声明中包括下列项目：一个铝午餐盒、12个甜品叉，1个金饰钉和链环和她的结婚嫁妆（一对金手镯、一条带环子的脖项链、一块手表、一个18k黄金结婚戒指），但是许多贫穷的中国员工的罐装牛肉、猪肉、牛奶和大米、以及“上海的兰衣服”，“美国的羊毛毯”和“美国黄色卡其布衣服”等对更贫穷的中国职员而言就变成了窃盗和劫夺的目标。<sup>44</sup>海关如此担心以至于不断提醒员工不要在站内存放贵重物品。此外，如果说当地居民掠夺灯塔，灯塔人员也会骚扰他们。证据显示了当地妇女经常被灯塔管理员（他们有城市人的收入）看作是潜在性伙伴。这就在航标灯和它们的社区之间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冲突和误解。

---

<sup>40</sup> 前灯塔管理员卓尔敦声明的复印件，现存于 SHAC, 679 (9), 2136, 《处理法籍职员克罗迹（Cloarec）处理问题，1945—1946年》（Copy of statement from Mr. K.E. Jordan re Lightkeepers, SHAC, 679(9), 2136 ‘处理法籍职员克罗迹处理问题 1945-1946’）；厦门快信 9640, 1939年8月1日，现存于 SHAC 679 (1) 12239, 《施德司格先生的职业，1933—1948年》（Amoy Despatch 9640, 1 August 1939, SHAC 679(1) 12239, ‘Mr. I. Stetsky’s Career 1933-1948’）。

<sup>41</sup> 上海圣三一堂的浸礼记录显示汉壁礼西童公学偶尔带领一些居民前来受洗，而在他们当中欧亚混学者灯塔管理员和其他海关职员的孩子尤其突出，见例如 兰比宫殿图书馆, Mss. 1578, 第3卷, 1889年10月6日, 和1891年12月27日（Lambeth Palace Library, Mss.1576, Vol. 3, 6 October 1889, and 27 December 1891）。

<sup>42</sup> 古尔德：《哲学家灯塔站》，第84—87、97—98页。

<sup>43</sup> 地保柯生利的请愿书，载海岸巡稽致总税务司，7064, 1941年2月20日，现存于 SHAC 679 (1), 21007 《北渔山》（Petition from Tipao Ko Shengli, in CI to IG, 7064 20 February 1941, SHAC 679(1), 21007 ‘Peiyushan’）。

<sup>44</sup> 两份赃物名单都来自石碑山，第一份来自奕伟士夫人（见下面）：厦门，8980号，1935年2月28日，现存于 SHAC, 679 (1), 3659, 《石碑山绑架事件，1932—1935年》；厦门致总税务司，10 547号，1949年1月21日及其附件，679 (1), 21016, 《石碑山和东犬岛灯塔，1926—1949年》（Both lists of stolen goods come from Breaker Point, the first from Mrs C.H. Edwards (see below): Amoy no. 8980 28 Feb 1935,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Amoy to IG, No.10,547, 21 Jan 1949, and enclosures, 679(1), 21016, Breaker Point and Middle Dog Light Stations, 1926-1949）。

当这些社会关系被扩展了之后，各地区的权力结构也随之转变，随着这些外地职员的轮替，这些被扩大的社会关系使得当地社区的一些人们的社经情况凌驾于其他人，虽然这些外地职员有时位处边陲，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许多人似乎只能依靠他们私人的食品储存了，当管理员把他们船运进来时，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仆人，而不是在当地雇用新人。这样的行为在条约口岸毫不出奇，但是确加剧了在封闭的灯塔中的矛盾，尤其是当地的灯塔工和外地职员的仆人产生矛盾时。灯塔编年史家班思德 (T. R. Banister) 就记录了一些与渔民发生冲突的事例——“一种不受约束和不守规矩的命运”——也记录了偷窃储存物的情况。<sup>45</sup>有些灯塔坐落在通常无人居住但有时会有渔民季节性或更长时间地移居的海岛或半岛上。日常生活协定 (Modus vivendi) 通常可以达成共识，但是此协定中所规定的人都是生活在化外之地的，一个充斥着外国人的中国机构就带来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食品再次成为一个问题，食品增加与否，本地供应与否，以及食品的运送等都取决于运输船。驻守在大戡山 (Gutzlaff) 的中国员工请求供应船给他们带些新鲜食品来，而“我们通过流星运输船得到的食品不是干的就是咸的”。人们在这样地方所依赖的罐装食品令人沮丧地供应极少，1934年，海务巡工司承认说，“在诸如东碇岛 (Chapel Island) 等地的灯塔站，在一个海关运输船到来前的一段时间里，食品大概成为了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即使对于那些习惯于过苦日子的男人来说也是如此”。<sup>46</sup>恐惧当地的产品——这在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写给外国居民的指南中有详细的反复叮嘱（蒸煮、蒸煮或消毒是其回答，监视你的仆人并且检查他们是否洗过手）——在灯塔站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距离上都远离医疗帮助。罐装食品是解决之道。食品储存进一步使站点成为了抢劫（和内部盗窃）的目标，并且在危机中，人们会变得非常饥饿。这些私人食品供应往往在员工当中招致妒忌。但是罐头和酒瓶（在英国灯塔站酒精是受到禁止的，但海关记录仍然暗示酒瓶子堆积如山<sup>47</sup>）以及船运来的外国商品——书籍、唱片、衣服等——都特别使外国籍灯塔员工与更广泛的“商品帝国” (empire of goods) 相联系，与横穿讲英语区和其他帝国世界分享的消费市场相联系。<sup>48</sup>李派林急汁 (Lea & Perrins) 果酱、立顿 (Lipton) 茶叶，还有印度淡啤酒 (India Pale Ales)，都令人在从海关运输船那里卸下来、在石碑山灯塔站尚未开封的储存品上浮想联翩，就像它们在南宁、太原或上海所作的那样。

中国籍灯塔员工在海关人事关系上是不清楚的。他们都未列于海关职员录 (Service-Listed)，这就是说他们是在当地被雇用的，也是在当地工作的，并

<sup>45</sup> 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37—39页。

<sup>46</sup> 大戡山的请愿书（大约在1934年9月）现存于SHAC, 679(1) 696；变种：白特克致海岸巡稽，1947年7月16日，现存于SHAC, 679(1), 10668，《白特克先生的职业，1931—1948年》；东碇岛：海岸巡稽致税务司，厦门，1934年4月13日，现存于SHAC, 679(1), 3981，《员工：灯塔，1932—1937年》(Gutzlaff petition (c. September 1934) in SHAC, 679(1) 696; Variety: Broderick to CI, 16 July 1947 SHAC 679(1), 10668, ‘Mr. W. Broderick’s Career, 1931—1948’; Chapel Island: CI to Commissioner, Amoy 13 April 1934, SHAC, 679(1), 3981, ‘Staff: Lights, 1932—1937’ )。

<sup>47</sup> 巴斯特：《史蒂文森灯塔站》，第243页。

<sup>48</sup> 这句话来自 T. H. 布里恩：《一个商品的帝国：美洲殖民地的英国化，1690—1776年》，载《英国研究杂志》25: 4, (1986) (T. H. Breen, ‘An Empire of Goods: The Anglicization of Colonial America, 1690—1776’,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4, (1986)), 第467—499页。

且都在正式编制之外。在海关海务处存在的 80 多年里，只有 33 名中国灯塔管理员获得了正式员工身份，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委任都发生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在 1927 年系统的培训问题被提出之前，一些灯塔确实是由中国员工护理的，例如位于白节山(Bonham Island)的第三线灯塔从 1909 年到 1912 年，后来又从 1927 年起，便是如此。东亭山灯塔(Tongting)在 1907 年开始投入使用之后一直由中国人运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出重新招募外国职员的方案，也逐渐相信在不需外国职员的监督之下中国职员同样可以有效率地运营灯塔，这样一来，招募外国人也逐渐停止了，这些都使招募中国人的争论愈演愈烈。招募是问题的核心。大多数未列题名录的职员都是当地灯塔的“苦力”(coolies)，这些人人都不是可造就的材料，但是工作需要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和基础的语文能力(包括书写基本的中文字和英文字)。再者，保障一批“较价值量的中国人”是海关的当务之急。大部分航标灯员工都是当地男人，都来自他们与之紧密联系的附近村庄，但海关的实际情况却是要根据人员需求调动员工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说服员工或长或短时间地离开某个地方，以便填补空缺，也是一种晋升。为了正式培养一批新的资深干部，在题名录上的华籍灯塔职员需要招募一群可以遵守海关规定的骨干。未在题名录上的华籍职员不可能也不愿意服从这些规定。但是有“许多更可被接受的机会”适合于那些符合所需条件的人。报酬是低廉的，即使受雇用的一个前提要求是被雇用者能够讲和读基本的英语和汉语。<sup>49</sup>

外籍灯塔管理员经营着大概实际上是黑箱作业，非正式地阻碍中国人晋升的机会。1932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没有一个外国的灯塔管理员像是认为有必要培训他们手下的人掌握比保持一盏灯明亮这类的基本原理更多的知识。”结果，很少有资深的中国籍灯塔管理员能够获取足够的经验，令人放心地履行其职责。因此，只有 4 位被认为获得了有效培训。1931 年 7 月，在佘山灯塔站建起了一所一班 6 名学员的培训学校，但是人们发现很难设计有效的培养方式来训练这些文盲，因此到次年 8 月，培训学校就关闭了。<sup>50</sup>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多的灯塔攻击事件，在那里，“外国”被视为盗匪的奖品，当然同时也尝试着改变职员的组成结构，但是在太平洋结束前，没有任何有效的进展。

在 1930 和 1940 年代，灯塔管理工作变得危险起来了。主任管理员白诺佛思(P. Baronowsky)和他的助手白洛达(Balrod)在 1933 年 12 月 21 日收到了一封来自一艘中国平底帆船(junk)的信函，该信函开头便称“致北渔山灯塔的两位外国人”：“我们手头有点紧，借个两万来周济一下”。该信温馨地提醒着：“如果你们在信件到达一周后未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我们将对你们进行一系列严重打击。”这个岛子立即被恐慌笼罩了，当期限即将到达时会，两个灯塔管理员拼命地向过往船只发信号要它们过来将他们带走，但毫无效果。当海关灯塔运

---

<sup>49</sup> 海岸执行巡稽致总税务司，6408 号，1937 年 5 月 25 日，包含一份港务长致芝罘税务司的报告副本，1937 年 2 月 24 日，现存于 SHAC 679 (1)，15673，《关于灯塔管理员的一般问题，1927-1937 年》(Acting C.I. to I.G., No.6408 25 May 1937, containing, Copy of a report from Harbour Master to Chefoo Commissioner, 24 Feb 1937, SHAC 679(1), 15673, ‘Gen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Lightkeepers’, 1927-1937)。

<sup>50</sup> 海岸巡稽致总税务司，4761 号，1931 年 10 月 27 日，《主任秘书致海务巡工司》，5695 号，1932 年 8 月 22 日，现存于 SHAC, 679 (19)，15947，《工程师和中国灯塔看守员培训学校》(Coast Inspector to I.G. No. 4761, 27 October 1931, Chief Secretary to Marine Commissioner, No.5695, 22 August 1932, SHAC, 679(19), 15947, ‘Training School for Engineer and Chinese Lightkeepers’)。

输船<<流星>> (Liuhsing) 到达时, 一位海关护卫队军官和 11 位带枪的男子也被运来了, 他们围绕着灯塔基座建起了一个炮台, 而巴罗诺夫斯基、巴劳德和“一个本土管家”已经逃进灯塔寻求安全了。为了航标灯的安全而动用海关的财力和人力的潜势变得越来越大了。<sup>51</sup>文件显示出了一个日益严峻的困难形势, 就是由中国员工负责的站点也不更安全了。1937 年 9 月 17-19 日, 一些海盗袭击了唐脑山灯塔站 (South West Horn), 抢劫了站点并最终绑架了站点的人员, 将他们困置在一个孤岛上。<sup>52</sup>1940 年 6 月, 七星山灯塔站 (Incog) 一位不知名的员工遭到了同样命运。主任灯塔管理员林 (Lin) 报告说: “他们用灯塔站的存粮为自己煮饭, 同时还到站点的各个角落寻找食物。他们威胁要杀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敢进行任何抵抗以制止他们这么做, 只能用好话请求他们不要毁了这个站点。”<sup>53</sup>对于毗邻村庄的灯塔站来说, 灯塔的大院子似乎被更多地看做一个避难所。1939 年 10 月, 主任超等一级灯塔管理员白特克 (C. Broderick) 报告说: 当村民看到“陌生的帆船”时, “他们就带着他们所有的财物跑到站点来, 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 根本无法让他们离开。”<sup>54</sup>

因此, 这是一个紧张的世界。海关外班人员在最好的时候也是处于高贵体面的条约口岸社会的边缘上的。不过, 通过运输船、国籍以及分享其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他们与这个世界还是有联系的, 他们也处于地方社区之中。在矗立于上海外滩的赫德雕塑的嵌板上、条约口岸和海关的宣传中, 航标灯灯塔被称赞一项重大成果 (参见例如在班思德出版于 1933 年的《中国沿海灯塔志》一书中的报刊文章), 但是与以城市为基础的同事们相比, 灯塔管理人员已经远离中心地区了。在社会上不受重视, 与中国籍的下属——基本上是一些乡巴佬——一起生活在封闭的营地, 凡此都需要考虑在站点内外与他们保持适当的关系, 这变成一个很僵硬的模式。荷兰人邬特一个人时, 很难不将“手臂勒住当地职员的脖子强迫他们做好工作”。而且所有这些都会进一步复杂化, 如果这些欧洲人都无法确认其正式的身份, 或者, 像奕伟士那样, 如果他们属于欧亚混血者的话。他们可能是忠诚的英国人和英国统治机构的仆人, 但是国家可能并且已经做了, 对国籍分界线进行重新界定, 如果它认为有必要的话, 并且国家似乎很不乐意表现出某种相互的忠诚。<sup>55</sup> 奕伟士虽被教育成英国人, 但仍熟练地混迹于中国人社会; 他被一些英

<sup>51</sup> 见海岸巡稽致总税务司, 5327 号, 1933 年 12 月 22 日, 现存于 SHAC 679 (1), 21007, 《北鱼山》(See CI to IG, No.5327, 22 Dec 1933, SHAC 679(1), 21007, 'Peiyushan')。

<sup>52</sup> Chow A-yung 灯塔管理员的报告, 未注明日期, 现存于 SHAC, 679 (1), 698, 《灯塔站 (S-W) 信件往来》(第 3 卷), 1931-1939 年 (Report by Keeper in Charge Chow A-yung, undated, SHAC, 679(1), 698, Correspondence to and from Lighthouses (S-W) (Vol.III), 1931-1939)。

<sup>53</sup> 七星山灯塔站关于海盗的报告, 1940 年 6 月 30 日 [马劳白 1940 年 7 月 20 日致海岸巡稽备忘录附件], 现存于 SHAC, 679 (1) 684, 《东部指挥官致海岸巡稽, 1940-1947 年》(Report on Piracy from Incog Light Station, 30 June 1940 [appendix to I. MacRobert Memo 20 July 1940 to CI], SHAC, 679(1) 684 Eastern Commander to Coast Inspector, 1940-47)。

<sup>54</sup> 白特克 1939 年 10 月 30 日信函, 现存于 SHAC, 679 (1), 697, 《灯塔站 (K-S) 信件往来》第 2 卷 (W. Broderick letter, 30 October 1939, SHAC, 679(1), 697, 'Correspondence to and from Lightstations (K-S) Vol.II')。

<sup>55</sup> 仍在继续的关于英国政府对战时日本被拘留平民的赔偿问题 (“作为优惠的支付”是首选措词) 反映了英国人对在中国出生者, 暗指欧亚混血者, 依然保持的摸棱两可态度。当赔偿最终被同意时, 那些不出生在英国 (或者其父母不出生在英国) 的人仍被排除在外。这项决定在 2006 年得到重新考虑, 并且被强调他们战后与英国的联系的标准所取代,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人被排除在外。见迈克尔·坎宁安: 《日本人战俘和道歉政策——一场对抗历史和记忆的战役》, 载

国人视为一个身份暧昧的人，但也被另一些人视为中国人。更严重的是，他的弟弟在 1912 年被菲律宾移民局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根据美国的移民法规定。<sup>56</sup>

### 石碑山灯塔，1932 年

1932 年 2 月 28 日，在石碑山灯塔，许多此类问题浮现了出来。在距离海面 19 英里的地方，这个第二线灯塔（1928 年），居于海关灯塔的最高位置，最初建立于 1880 年。坐落在从香港起沿海岸前进的大约 130 英里处，距汕头 35 英里，它被建造在海岸线向北转向的地方，在 1870 年代后期发生过一些重大航行事故之后，建造这座灯塔就为当务之急，但也被看作是缩短向北航程的一个手段，否则的话，那些船只不得不给这个危险地点留出广阔的回旋余地。在这个用墙体包围着的复合建筑物内部，所有的设施都是绿色和受到护理的，与围绕着该站点“面积达 2 英里的荒芜不毛之地”形成鲜明对比，就象班思德在 1932 年记录的那样。<sup>57</sup>2 月 28 日下午大约 1 点左右，共产党第六军的 60 名士兵和 30 名搬运工，穿过高低不平，岩石丛生地段而来。外籍灯塔管理员请他们喝茶。“主任灯塔管理员的政策应当是与所有人都友好相处，而且只考虑他自己的职责”，几年后，海务巡工司把这一点宣布为一个基本规则，实际上这些基本原则早就付诸实践了。<sup>58</sup>航标灯为海洋服务，而灯塔管理员则被受命以照看海洋和它的交通为己任。喝茶是以“以友好的方式”进行的，该分队也在到达后 1 个小时撤离了。但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随身带走了奕伟士和逐侠诺，他们的妻子，奕伟士的 4 个孩子（而他的妻子又怀孕了）和奕伟士的厨子（cook）（在一些文件中有时候被当作他的一个男仆人（boy））。<sup>59</sup>

起先，共产主义者的军队也想把中国籍员工一起带走，但考虑到可能对过往船只产生可怕的后果，便把（中国籍工人）留下来代替他们，释放的理由是，他们是“工人”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带有潮普惠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光庆的签字的信留了下来，该信是写给香港总督的。它严厉指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勾结共同镇压中国，而且要“瓜分中国”。它要求派遣一位代表直接与苏维埃政府谈判。它还威胁说，如果试图以武力方式进行营救，就打死被劫持的囚犯，

---

《当代史杂志》39: 4 (2004) (Michael Cunningham.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Politics of Apology: A Battle over History and Mem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4 (2004)), 第 561—574 页。

<sup>56</sup> 亨利·阿瑟尔·爱德华兹 (Henry Atholl Edwards) 1912 年被拒绝进入菲律宾，原因在于他的“中国种族属性和血统”，虽然他父亲是个英国人，但母亲兰纽是中国人。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马尼拉，G. R. L-7474 号，1912 年 3 月 25 日，Henry Atholl Edwards vs. H. B. McCoy, The Lawphil Project, Philippine Jurisprudence, <[http://lawphil.net/judjuris/juri1912/mar1912/gr\\_1-7474\\_1912.html](http://lawphil.net/judjuris/juri1912/mar1912/gr_1-7474_1912.html)>, 资料获取时间 2007 年 8 月 3 日。

<sup>57</sup> 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 55—57 页。

<sup>58</sup> 海岸巡稽卡乃尔上尉致伊立新，1938 年 10 月 6 日，现存于 SHAC, 679 (1) 696 (Coast Inspector LC. Carrel to K.M.E. Eriksson, 6 October 1938, SHAC, 679(1) 696)。

<sup>59</sup> 除非另有说明，下面的描述选自富乐嘉税务司致海岸巡稽奚理满，汕头半官方 570, 1932 年 3 月 16 日，包括富乐嘉有关事件的日记，现存于 SHAC, 679 (1), 3659, 《石碑山绑架事件，1932—1935 年》(Unless otherwise noted, what follows is extracted from Commissioner H.G. Fletcher to Coast Inspector, H.E. Hillman, Swatow Semi-official 570, 16 March 1932, which includes Fletcher's diary of the incident: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摧毁航标灯。<sup>60</sup>3月7日，厨子带来了由这两个人写的（注明日期为3月5日）致灯塔巡视员（the Inspector of Lights）的一封信：

阁下，请允许我们告诉您上个月28日发生的事件，我和我的家人，逐侠诺先生和他的管家以及我的小仆人，被红军逮捕并被带到了不同地方。我们被迫给您，请求您仁慈地予以相助，按照红军发送给您的中文信要求交付赎金。红军宣称必须在一个月内交付赎金，否则他们将杀死我们。昨天晚上，我和逐侠诺被强行与女眷分开。

我们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您要尽快地解决赎金问题将挽救我们的生命。

持信人是我的小仆人，他被连带此信一起派出。他将向您解释一切。乞求您尽力挽救我们的生命。

敬上，等等。

奕伟士一级一级灯塔管理员  
逐侠诺二等二级灯塔管理员

附言：我的小仆人被要求在两周内带着您的赎金回来。红军威胁说，如果您通过武力解救我们——他们就将杀了我们——因此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用赎金来挽救我们的生命。

11天后，妇女和儿童以及厨子被释放了，并被海关税务司送往厦门。在由奕伟士的仆人递送的信中，要求在20天内支付赎金\$50,000。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Sir Frederick Maze）授权从海关基金中为每人支付\$10,000。<sup>61</sup>但是地方军事当局被激怒了，并且迅速采取了行动。人们无法说服他们同意交纳赎金，他们漫山遍野地搜捕游击队。倡议被发出到秋季试图找到被绑架者。有传言说他们已经被迫为苏维埃政府工作了<sup>62</sup>，但是在5月13日正式上报给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报告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正确。这两个人都死了。逐侠诺死于疾病，而奕伟士则被杀害，因为共产主义者的武装受到了地方“保安”队的骚扰。<sup>63</sup>另有可靠消息称，那两个人是在秋季被意外地杀死的，当时有士兵炸毁了一个游击队正藏身于其中的山洞，没有释放也在里面的俘虏。因为害怕这一错误行为，也因为早就知道一年前因中国宪兵（Chinese Gendarmes）在苏州杀害年轻的英国人约

---

<sup>60</sup> 汕头快信3号附件1，1932年3月8日，F3273/1895/10，TNA FO 371/16227（Enclosure No.1 in Swatow Despatch no. 3, 8 March 1932, F3273/1895/10, TNA FO 371/16227）。

<sup>61</sup> 梅乐和致富乐嘉，1932年4月5日，现存于SHAC，679（1）32370，汕头s/o（Maze to Fletcher, 5 April 1932, SHAC, 679(1) 32370 Swatow s/o）。

<sup>62</sup> 厦门S/O，1932年9月12日，现存于SHAC，679（1），3659，《石碑山灯塔绑架事件，1932—1935年》（Amoy S/O, 12 September 1932,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sup>63</sup> 汕头快信7140，1933年4月4日，现存于SHAC，679（1），3659，《石碑山灯塔绑架事件，1932—1935年》（Swatow Despatch 7140, 4 April 1933,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翰·桑波恩 (John Thorburn) 而造成的外交危机, 士兵们很显然隐藏了他们的尸体。<sup>64</sup>不管哪一个版本是真实的, 结论都一样。

虽然查找仍在继续, 尤其是在 8 月中旬奕伟士 74 岁的父亲和执行巡稽 (the Acting Inspector) 花德 (C. A. Watt) 及海关的一位二等一级帮办陈懋庵一起到这个地区作了为期 2 周的访问, 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消息。也尝试从一位香港警察侦探那里得到协助, 但要找到一个真正拥有当地专业知识的人证明是不可能的。在上海的英国高等法院 (the British Supreme Court) 于 1934 年 6 月 25 号正式宣布奕伟士被认定为死亡。<sup>65</sup>逐侠诺隶属于海关不感兴趣的司法管辖, 因此连这样的声明好像也没有被做过。

直到此时, 我们才获得一个清楚易懂的叙事。共产主义者游击队针对的是一个容易但具有象征性的目标。他们认为灯塔是英国殖民权力的一个象征 (他们当然不是最后如此看海关灯塔的人), 而且灯塔管理员是一个有用的赎金的来源, 用盗匪的说法就是“洋票”。他们写信给奕伟士的父亲说: “海关每年从穷人身上榨取了很多钱, 这些钱被上缴给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用来镇压工人和农民。现在我们仅仅希望他们拨给我们 \$50, 000 以充实我们的革命基金。这个数目并不太多”。<sup>66</sup>海关已经尽可能快地提醒中国民事和军事当局关注此事, 虽然因为奕伟士是一位英国国民, 汕头税务司明显决定利用英国领事更大的潜在影响力, 而后者最初也凭借权威积极介入了干涉。他依次提议皇家舰队“白厅”号 (the Royal Navy's HMS Whitehall) 运送中国军队到灯塔, 但遭到拒绝, 而军舰“凯伯尔”号 (HMS Keppel) 则被派出到航标灯附近检查形势, 因为海关灯塔运输船距离太远了。还有人试图利用殖民地香港的资源。《泰晤士报》(The Times) 刊登了 3 份不连贯的报道, 而在绑架后 12 个月里有 3 个问题在议会中被提出, 然而中国盗匪并非什么例外消息, 甚至“红军”也不是, 与两个默默无闻的海关灯塔管理员事件相比, 廷克·保利 (Tinko Pawley) 事件是一起更引起轰动的发生于 1932 年的人质绑架案。<sup>67</sup>作为事件的后果, 海关重新考虑了它使用外

---

<sup>64</sup> 毕可思: 《一个年轻上海人的死亡——1931 年桑波恩事件与英国在中国条约口岸的防务》, 载《现代亚洲研究》, 30: 2 (1996) (Robert Bickers, *Death of a Young Shanghaileander: The Thorburn Cas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Treaty Ports in China in 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30:2 (1996), 第 271—300 页)。

<sup>65</sup> NCDN 剪报, 1934 年 6 月 26 日, 现存于 SHAC, 679 (1), 3659, 《石碑山绑架事件, 1932—1935 年》(Clipping from NCDN 26 June 1934 in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sup>66</sup> 潮州普惠来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致小黑先生, 汕头快信 3 号附件 3, 1932 年 3 月 8 日, F3273 / 1895 / 10, TNA FO 371 / 16227 (Soviet Government of Chaozhou-Puning-Huilai Districts to Mr Little Black, Enclosure No.3 in Swatow Despatch no. 3, 8 March 1932, F3273/1895/10, TNA FO 371/16227)。

<sup>67</sup> 《中国红军搜查灯塔》, 载《时报》, 1932 年 3 月 1 日, 第 15 页; 简讯, 1932 年 3 月 19 日, 第 11 页, 报道家属被释放; 被俘欧洲人的命运, 1932 年 5 月 19 日, 第 11 页; 报道他们被杀害。廷克·保利: 《我的匪盗主人》, 普利茅斯, MA: 五月花出版社, 1935 年。关于这一主题可见徐有成和贝思飞: 《当世界相撞时——中国的土匪及其“洋票”》, 载《现代中国》26: 1 (2000), 第 38—78 页 ('Chinese Reds' Raid on Lighthouse', *The Times*, 1 March, 1932, p. 15; six lines in a 'Telegrams in brief' column on 19 March 1932, p. 11, reporting the release of the families; 'Captured Europeans' Fate', 19 May 1932, p. 11, reporting the announcement of their killing. Tinko Pawley *My Bandit Hosts* (Plymouth, MA: Mayflower Press, 1935). On the subject generally see Xu Youwei and

籍管理员的问题，因为中国籍管理员“无论怎样赎金价值会更小，实际拥有的财产会更少”。海务巡工司意识到，把中国员工配置到主要灯塔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而在石碑山灯塔站或许可以开一先例”。<sup>68</sup>

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有关共产主义者起义、反对帝国主义活动以及非正式帝国和中国的常规政策的故事，就某些方式而言十分平常：惯常的怀疑促成惯常的行动，动用了炮舰，中国站点发出呼叫；领事呼吁中国的对口单位；大使则讲一些语气平静的话。但是真正的故事要混乱得多，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殖民主义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纠葛。在 1933 年 11 月的一封详细的半官方信件中，汕头税务司许礼雅 (H. D. Hilliard)——一位有着 30 年工龄的老职员一向总税务司提供了他所掌握的信息，通过详细核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奕伟士和逐侠诺要被绑架了。<sup>69</sup>然而在考虑这些证据之前，有必要首先说明为什么奕伟士在灯塔站占据首要地位。

奕伟士 1895 年出生于厦门。1916 年，他的父亲，弗兰克·休·爱德华兹 (Frank Hugh Edwards)，在那里的国际拓居地或者说英国租界担任警察总长 (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他在此任上一直到 1925 年 (他在 1929 年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拍卖商”)。大约在 1858 年生于新加坡，拥有英国、西印度、荷兰和爪哇等的混合血统，他的中文绰号称作“小黑子”。他在当地的显著地位大概可以解释下列事实，即绑架者也给他写了一封信。奕伟士的母亲是中国人。<sup>70</sup>这个年轻人在 21 岁的时候在厦门伦敦传教会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并在一年后，也就是 1917 年 10 月，进入海关工作；此前他曾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临时职员。<sup>71</sup>作为一位绑架受害者，他的文法是可以原谅的，但他所写的拙劣短笺表明他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学生。对于英国籍父亲——不管是大都市里的人还是像弗兰克·爱德华兹那样离岸的英国人 (offshore Britain) (他的背景与香港高和尔 (Daniel Caldwell) 或上海麦高云 (Kenneth John McEuen) 的背景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在亚洲出生的英国人，在条约口岸世界日益发展的保安机构

---

Philip Billingsley, 'When Worlds Collide: Chinese Bandits and Their "Foreign Tickets"', *Modern China* 26:1 (2000), pp. 38-78)。

<sup>68</sup> 海岸巡稽致总税务司，4903 号，1932 年 6 月 20 日，现存于 SHAC, 679 (1), 3659。《石碑山绑架事件，1932—1935 年》。也见副执行巡稽卡乃尔由于绑架事件而对雇佣员工问题发表的意见，致琼州、厦门、芝罘海关税务司，1932 年 5 月 17 日，现存于 SHAC, 679 (1), 3981 (CI to IG, 4903, 20 June 1932, SHAC, 679(1), 3659, 'Breaker Point Kidnapping Incident', 1932-1935. See also Acting Deputy Coast Inspector L.R. Carrell's urgent note on staffing issues in the wake of the kidnapping sent to 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t Kiungchow, Amoy, Chefoo, 17 May 1932, SHAC 679(1), 3981)。

<sup>69</sup> 本段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均见于该信及其附件 (Swatow S/O No.617, 30 November 1933, SHAC, 679(1) 32370)。

<sup>70</sup> 我虽然未找到奕伟士的出生登记，但可以确定信兰纽 (Lian Niu) 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马尼拉，G. R. L-7474 号，1912 年 3 月 25 日，Henry Atholl Edwards vs. H. B. McCoy, The Lawphil Project, Philippine Jurisprudence, <[http://lawphil.net/judjuris/juri1912/mar1912/gr\\_1-7474\\_1912.html](http://lawphil.net/judjuris/juri1912/mar1912/gr_1-7474_1912.html)>, 资料获取时间 2007 年 8 月 3 日。

<sup>71</sup> 奕伟士：《履历表》，现存于 679 (9), 2229, 《海关人员履历表：收回：外国，1932 年》 (C.H. Edwards, Memo of Service, in 679(9), 2229, 'Memo. of Service: Withdrawals: Foreign, 1932')。

中找到一份职业<sup>72</sup>) 的后代来说, 海关职员或低级工作是典型的工作岗位。社会甚至教育上的边缘化(条约口岸的精英学校拒绝接受欧亚混血儿童), 或者是条约口岸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家里”教育他们的孩子, 他们因此构成了劳工阶层中“中国出生者”这一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个称呼决不是一种恭维。对英语及讲英语区文化规范的熟悉, 加上家庭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家庭在当地的关系网, 以及拥有治外法权, 能够帮助获得雇用。<sup>73</sup>在条约口岸的基础设施中, 他们可以发挥有用的, 通常是居间调解的作用。的确, 条约口岸“葡萄牙人”——澳门人——就在整个中国条约口岸中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较少可见的是, 盎格鲁—中国人(the Anglo-Chinese)也在讲英语区世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然而正式的英国机构对他们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而所有的厌恶, 如果不是憎恨的话, 都与他们所处的大众文化和高眉毛文化(higher-brow culture)密切相关。<sup>74</sup>因此奕伟士以一位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人的身份来到了航标灯服务处, 他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他需要就业; 同时航标灯为外国籍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1916年, 奕伟士通过与程辰琴(Ch' eng Ch' ien Chin)的婚姻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边缘英国籍身份。然而他的职业地位使得他没有更多的婚姻选择, 实际上, 对于欧亚混血的男人来说, 婚姻比在这种就业情况下的其他英国人受到更大的限制。他们要找个英国妻子也是很困难的, 欧亚混血者就更不用说了。<sup>75</sup>兄弟两人都娶了中国女人为妻。程是一位鼓浪屿商人的女儿, 她简单明了地在一个中国语言世界里生活了15年——她的一个声明就是用中国话作出的。然而, 他们的婚姻当时并未完全得到官方许可, 直到1925年在英国领事馆得到重新认可。在奕伟士的婚姻得到领事的认可后, 这一婚姻所产生的4个未登记的孩子的事又得到了协商, 最后也被驻厦门的英国领事馆接纳了。后来又花了2年时间才得到来自伦敦的正式答复, 孩子的出生获准登记注册(另外两个孩子出生在伦敦的信刚刚到达之后)。伦敦的回信催促他“放正自己的位置……不再有任何怀疑”, 并且作一个法定的有关“其出生、本人的国籍和他与孩子的母亲的婚姻”的声明。<sup>76</sup>但他似乎并没有这样做, 虽然在伦敦的许可到达后不久他的孩子都正式注

---

<sup>72</sup> 关于高和尔见克里斯托弗·穆恩:《盎格鲁—中国——香港的中国人和英国的统治, 1841—1880年》, 列治文: 库尔尊出版社, 2001 (Christopher Munn's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关于麦高云见我的《帝国创造了我》(Empire Made Me), 第68页。

<sup>73</sup> 奕伟士的哥哥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过海军承包商; 他的大儿子就读于香港一家学校。

<sup>74</sup> 论述此类社区的著述十分罕见, 但可看王之成(音):《葡萄牙人在上海》, 澳门基金会, 2000年(Wang Zhicheng, *Portuguese in Shanghai*. Macau Foundation, 2000), 以及彼得·霍尔:《在网中》, 威卢: 彼得·霍尔, 1992年(Peter Hall, *In the Web*. Wirral: Peter Hall, 1992)。见毕可思:《在华的英国》第3章(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hapter 3)有关讲英语区小说对欧亚混血者的描写。

<sup>75</sup> 彼得·霍尔的书是一个有关这个相互关联的欧亚社会的家谱调查, 是以他与之相连的香港家庭为基础的。

<sup>76</sup> 奕伟士致W. 梅里克·休利特, 1925年7月11日; FO致H. H. 布里斯托弗, 领事, 厦门, 1927年8月16日,《奕伟士孩子的出生登记》, TNA, FO 663/26。(C.H. Edwards to W. Meyrick Hewlett, 11 July 1925; FO to H.H. Bristow, Consul, Amoy, 16 August 1927, 'Chas. H. Edwards, Registration of births of children', TNA, FO 663/26)。此信是我所找到的唯一一封奕伟士的亲笔签字信。

册了。<sup>77</sup>在官方看来，奕伟士的身份已经受到了损害。他是一个需要证明自己正式的英国国籍的人，他的孩子们的英国国籍更需要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领事会给以同情，知道盎格鲁—中国的欧亚混血者在英国人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宗主国（the metropolitan state）却不大愿意迁就，领事本人则在其他一些邮件中表达了他们个人对他们的同情。<sup>78</sup>

正当奕伟士试图使他自己和他的孩子的官方地位合法化的时候，他的私人世界明显地远离了合法。这里似乎显示了导致其毁灭的线索。如果说他的身份是导致他遭到莫名其妙的绑架的一个原因，那么他的个人行为就是另外一个原因，而且的确他的行为——在打击到来之前的许多年间——就已经注定厄运的降临。这些事件根源于灯塔和灯塔员工——在本案则是奕伟士——对当地共同体，尤其是对当地妇女的影响。这个英国人最初是在 1924 年被安排到石碑山工作的，一共在职 5 年。1925 年，他收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名叫黄阿花，来自灯塔西北方向 5 英里处的武宁村。据说，她被好心地当作一个“妹仔”，即一个女性奴仆，加以正式地接纳了。程后来称她为“我收养的小妹妹”（尽管也认定起先是程的母亲收养的）。不管怎样，既然是“收养”了，奕伟士就正式承担了他的家庭对她的责任。<sup>79</sup>但是当奕伟士的家庭定居于东碇岛灯塔站——沿海岸向东北走 110 英里可抵达厦门——时，黄在 1931 年 2 月死掉了。她当时只有 14 或 15 岁，死的那天她脱下鞋子并把它们整齐地放在岩石上，然后自己跳入水中。她的行为表明为自杀。在从海里打捞出她的尸体后，员工们为她打了一口粗糙的棺材并将其埋葬在了灯塔站的南头。<sup>80</sup>东碇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孤立场所，中国员工肯定不喜欢去。它也很难抵达，位于距离海岸 8.5 英里处，每个月只有运输船光临两次，除此之外便是灯塔巡视员两月一次的造访。<sup>81</sup>但是没有任何暗示表明黄不高兴或是孤独的一程说道，“她非常幸福，我完全想象不到她为什么要自杀”。<sup>82</sup>我们或许能够合理地推测促使一个孩子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或许会提到我们所知道的在外国男人当中特别是在灯塔站里的外国男人明显的性文化，我们不能排除灯塔站的某个人的性侵犯或类似行为在本案中的责任。

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谁是罪魁祸首，奕伟士被卷入了与这个女孩在武宁村的家庭久而未决的谈判。的确，灯塔管理员桑士（G. E. Sands）曾经告诉过税

---

<sup>77</sup> 厦门领事的出生登记实际上对弗兰克·休·爱德华兹三个已知的孩子都没有入籍效力。但是他们信心十足地坚持为他们的孙子们争取一个合法的过籍，之所以会出现缺少法定声明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奕伟士的出生从来没有正式注册。这就可以使他的身份地位模棱两可。如果他的父母实际上属于未婚——至少在厦门此类婚姻是不会登记在册的——，那么他就有资格要求其英国人身份。

<sup>78</sup> 关于领事的同情心可见例如影院经理 H. C. 贝斯特（H. C. Best）事件。贝斯特是由一个未婚的英国父亲和一个中国母亲在厦门生的，他的英国保护权在 1930 年被收回。（TNA, files F0228/4073 84x 1929 and F0228/4324 84x 1930）。

<sup>79</sup> 奕伟士夫人 1933 年 10 月 25 日声明翻译，汕头 S/0617 号附件 6；玛丽亚·贾绍克：《妻妾和奴仆——一个中国海关职员的社会史》，伦敦和新泽西洲：蔡德图书公司，1988 年（Translation of Statement from Mrs. Edwards, 25 October 1933, Enclosure No. 6 in Swatow S/O No. 617; Maria Jaschok,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 London &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1988）。

<sup>80</sup> 在班思德的著作中，埋藏工作实际上也是论述灯塔站活动的一个题目，因为有不少废旧物或其他东西堆积到站点附近，尸体被冲到海岸。

<sup>81</sup> 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 81 页。

<sup>82</sup> 奕伟士夫人 1933 年 10 月 25 日声明翻译，汕头 617 号附件 6（Translation of Statement from Mrs. Edwards, 25 October 1933, Enclosure No. 6 in Swatow S/O No. 617）。

务司许礼雅，奕伟士特别要求回到石碑山工作，以便就地彻底解决争端。在他到达之前，他先派他的厨子与受害人家庭协商。等到家庭到来时，程辰琴已经给了女孩的母亲\$30 作为赔偿。但是争议似乎要顽固地持续下去。厨子好像一直试图就此事件勒索奕伟士，他还联合了灯塔站员工中的村民，其中包括黄阿华父亲的两个老乡。<sup>83</sup>虽然灯塔巡视员花德 (C. A. Watt) 坚决镇压了在当地动乱和打砸抢背景下发生的攻击灯塔站事件——列举了一系列在临近村庄发生的类似事件——而且虽然这个地区大部分地方尚未出现共产主义者的叛乱，但是其他一些海关同事私下里已经意识到在奕伟士“与当地村庄和当地妇女的关系中……他的行为确实 [是] 非常丢脸的”。<sup>84</sup>程辰琴在她被释放后特别揭露了隐藏在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些真实故事。从程的声明中可以概括地勾勒出发生在女孩的家庭、他们在灯塔站的同乡以及游击队之间的共谋。厨子成为这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了。我们知道灯塔站里按照种族划分的雇用等级制 (the still-raced employment hierarchy) 为中国籍员工和外国籍员工之间的对抗提供了众多潜势。外国上司对中国籍员工体力的滥用并不是过去的事情。外国人的中国伙伴或者妻子的临在可能进一步影响关系的动力学，他们可能会描绘出新的身份冲突场所，而且他们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术语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中国籍员工发生紧密联系。没有人是其仆人，或者在本案中，是其厨子的英雄。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程辰琴对当地灯塔站员工为了某些人的利益与游击队勾结的猜想，而且这些猜想在其他观察者那里也有回应。在大白天明目张胆地带走人质的绑架行动完全可以被假设为一个假象。游击队员从其聪敏才智中获益匪浅，这一才智帮助他们攫取那些“洋票”，并且为其全部的政治戏剧——谴责英国帝国主义和香港政府——赎金是最近的目标，而黄阿华的家庭或许担保着复仇的重任。后一点听起来更像萨默赛特·毛姆 (Somerset-Maugham) 的文学创作而非领事或海关的记录，但是事件的具体细节被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故意地不加追究了。就本质而言，这很明显地是一个令领事和税务司感到太肮脏和太丢脸的丑闻，以至于希望完全抹掉它。

最不可信的是把杀害逐侠诺或奕伟士事件说成预先计划好了的——一个死人质是毫无价值的，而且可能导致更加激烈的报复。(虽然没有进入当地苏区，但在1925年和1927年，英国警察或海关曾在香港以外对位于“大亚湾”的“海盗”村庄进行过打击——在后一行动中甚至使用了飞机。<sup>85</sup>无论如何，对所有有关人员来说，所有事情都做错了，特别是地方军队根本不想进行谈判或缴纳赎金，而是实施了严厉的反游击队战争，骚扰了沿途的战斗者。两名人质在途中某处死掉

---

<sup>83</sup> 故事变得非常复杂了，但简单地说，厨子随后加入了在汕头的当地公安部门，1933年10月逮捕了一个被他说成是绑架者之一的人。结果证明这是一个诬告，厨子/警察反过来被拘捕了，并且他在事件之前，之中及之后有问题的角色明朗化了。他也经常勒索石碑山的中国员工，他们对于在事件过程中被偷盗物品的补偿要求因此大大提高了。

<sup>84</sup> 南灯塔巡稽花德先生致厦门税务司的备忘录，未注明日期，1932年10月，汕头 S/0617 号附件 5，1933年11月30日，现存于 SHAC, 679 (1) 32370; 广州快信 32 号，1934年3月8日，附加在 Peking, 1043 号，1934年7月21日，F5243/388/10, TNA, FO 371/18127 (Memorandum from Mr. Watt, Inspector of Southern Lights to Amoy Commissioner, no date, October 1932, Enclosure No.5 in Swatow S/O No.617, 30 November 1933, SHAC, 679(1) 32370; Canton Despatch No.32, 8 March 1934, enclosed in Peking No.1043, 21 July 1934, F5243/388/10, TNA, FO 371/18127)。

<sup>85</sup> 《时报》，1925年1月22日，第11页；1927年3月25日，第14页。(The Times, 22 January 1925, p. 11; 25 March 1927, p. 14)。

了。外交官和海关所能做的只剩下宣布两人的死亡并给予他们最近的亲属一定的补偿。外交官代表奕伟士的利益，确保这是足够的（不希望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个带着 7 个孩子的悲痛哀伤的英国国民），但海关对她的态度比较好（可能是感觉到有必要这样做，从而消除其他海关员工的忧虑）。或许也为逐侠诺的“非官方妻子”作了一些事情，但有关她的情况，所有的记录几乎都没有提及。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而且文件对她的国籍也有不同说法。在 1934 年 6 月 25 日，奕伟士被正式宣布为死亡的时候，上海最高法院对石碑山绑架事件作出了官方了结。

条约口岸的新闻界曾在 1931 年针对上海英国人约翰·桑波恩失踪事件进行过广泛报道；这个人被描述为一个无辜的、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希望使自己变得更好并“做些好事”。相反，对于英国灯塔管理员被绑架事件，新闻界基本保持沉默。<sup>86</sup>桑波恩是一个定居的上海人，一个希望在条约口岸商务部门获得雇用“低阶层白人”（low-white）。但他是道地的英国人，而英国条约口岸的积极分子需要一个借口（a cause célèbre），以便激起反对废除治外法权改革的言论。作为一个欧亚混血者（领事官尖锐地指出，他的父亲“已经通过其中文昵称证明了有关其种属的回答”<sup>87</sup>），他出生于厦门并与一位中国妇女结了婚，而且作为一个男人，他在社会上和身体上都工作于边缘地带，远远超出了上海人的视野；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雇员，奕伟士也根本不在殖民地的体面和包容范围之内。这就意味着，当奕伟士遇到麻烦时，警察或海关根本没有像对待桑波恩那样举行群众集会，上海的新闻界也没有发起广泛争论。他的地位、他的背景、他的特征太不明确了，或着说在英国条约口岸的眼中，太缺乏吸引力了。

尽管如此，奕伟士仍然是一个英国国民，至少到 1932 年国家开始关注时（即使有可能通过一次正式调查剥夺他的这一身份），英国官方机构也抱持同样观点，但是各类文件有意要迷惑读者。它们的语气如此微弱，远不及绑架事件应当被期待具有的语气，甚至还考虑到了奕伟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评论他与当地妇女的关系，和从条约口岸地理来看的事件发生地点的偏僻。只是在后来很晚的时候才知道，一个较早的、源自对记录的稀少进行反思的结论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奕伟士有一个中国母亲的事实也被确定了。这不是一起正常的绑架。它根源于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的微观政治学，根源于共产主义者暴动在广东东部的兴起，根源于那些被配置在技术现代化前哨的外国人的复杂生活，根源于英帝国的中国人世界的广泛紧张关系，以及英帝国的中国人世界与中国人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在充满恶臭气味的石碑山灯塔站的小画像中，在中国，更广泛地在殖民地世界，外国人的存在和外国强权的更大冲突、更大紧张关系和更大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

## 结语

石碑山航标灯、以及海关船舶署其他航标灯和设施的阴影笼罩着它们与之毗邻的共同体，就像哈罗德·伊萨克“高耸的工厂烟囱”遍布诸如上海之类城市边

---

<sup>86</sup> 毕可思：《一个年轻上海人的死亡》（Bickers, *Death of a young Shanghailander*），第 286 页。在 1932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24 日之间，《北华捷报》登载了 5 个重大故事。

<sup>87</sup> 汕头快信 8 号，1932 年 4 月 9 日，F3273 / 1895 / 10，TNA FO 371 / 16227（Swatow Despatch no. 8, 9 April 1932, F3273/1895/10, TNA FO 371/16227）。

缘“仍旧用木犁耕作”的田野间。<sup>88</sup>本论文透过航标灯系统、它的员工以及它对于理解外国势力在中国活动的广泛性特征的潜力来探究海关管理部门的基础结构；在此，这个底层结构世界无疑属于外国势力在中国活动的一部分，同时它又经常是中国的代理机构。航标灯系统与其员工群体之间的对照是令人感兴趣的。当然，任何此类系统或组织与其员工生活之间的对照有时是同样强烈的，但在石碑山事件中，国籍、种族、阶级都是关键性背景因素，这种结合是帝国和帝国在中国的非正式世界的本质性构造。就本案来说，存在于海关的正式地位与其所发挥的非正式作用之间、海关职员作为中国政府雇员的正式身分与他们在英国的和其他的共同体之中所处位置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我们对在中国的英国势力的复杂多样性获得了很多认识。英国国家力量在中国的自发的或正式的活动是相当复杂的。就是在航标灯系统中也是如此，而我们想做的仅仅是一个个案研究。它是外国势力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据以实现把中国从结构上整合到全球网络中的工具，而我们实际看到的一些东西却远不是一清二楚的。航标灯灯塔站是一些尴尬的地方，也被配置了一些尴尬的（并且是被尴尬地任命的）人员，这些人的故事和困境引导我们放弃了那些简易的、二元论的定性分析条约口岸世界的做法，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直接考察其时态、相互联结和把武宁村、石碑山灯塔站、厦门、上海及其他更远地方紧紧地网连起来的方式，对它们作出分析并加以理解。

(孙立新、石运瑞译， 张志云校)

#### 作者简介：

毕可思 (Robert Bickers)，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学教授。

#### Contact:

##### Robert Bickers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11 Woodland Road

Bristol BS8 1TB

United Kingdom

T: 0117 928 7930

Email: [Robert.Bickers@bristol.ac.uk](mailto:Robert.Bickers@bristol.ac.uk)

#### 译者简介：

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sup>88</sup> 哈罗德·伊萨克：《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塞克尔和瓦堡，1938年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8)，第1页。

石运瑞,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地理学”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生。